

现代世界的诞生

□ 刘北成

文化·麦克法兰教授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在国际学界享有广泛的声音。

2011年春，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邀，作为“王国维纪念讲座”学者，麦克法兰教授发表了题为“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系列演讲。一年后，他在演讲基础上写成了本书。如麦克法兰本人所言，这次演讲和这部著作是他毕业学术思考的一份总结。他四十年来探索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本书书名可以说是他本人十几部著作的一个总标题。

麦克法兰在“致中国读者”里表示，他是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和中国读者对话。他估计自己的观点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意外。此言不虚。不过，正如他指出的，中国读者的许多观点其实来自西方。可以说，在西方学术界，他的见解也是自成一家之言。现代世界的起源和特征，可以说是近现代人

文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近些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围绕着对“大分流”的解释展开的。所谓“大分流”指的是近代“西方的兴起”和“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所谓停滞。一些学者基本沿袭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思路，强调东(中)西有别，认为资本主义或现代性只能在西方的特殊性中产生出来。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东亚和西方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暂时的分离。

麦克法兰属于第一种学者，而且走得更远。概括起来，麦克法兰探讨的是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现代世界起源于何处，二是现代性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起源于英格兰。在他看来，“欧洲的奇迹”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的奇迹”。这是他始终如一所坚持的观点。早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1978)一书中，他就主张，从12世纪起，英格兰就与欧洲其他地区分道扬镳，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核

心特征，即经济和法律上的个人主义特征，此后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第二个问题，麦克法兰是按照人类学家的方式，来描述英格兰“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特征。

麦克法兰对英国家庭关系、婚姻的现代性特征的描述也很有趣，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里关于资产阶级打破传统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的论述。不过，麦克法兰教授也补充了另一个正面的因素，即友谊。与亲属关系不同，友谊不是由血缘带来的，友谊应该说至少有两个特征，一是与某种共同经验相关，二是友谊有自主性。按照麦克法兰的描述，在原子化社会里，友谊为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石。另外，通过对英国家庭关系的分析，麦克法兰也给我们解释了英国家庭佣工习俗的秘密所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家庭佣工习俗也是英国现代阶级制度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尊卑有序的社会习俗的重要支撑？

谈到英国人的精神世界，麦克法兰呈现的是一幅更加纷纭的画面。在全球化时代，他反而揭示英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及其隐秘的培养机制。他对比法国人和美国人，分析了英国人既向后看又向前看的双向态度。英国文学是英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麦克法兰对英国文学的概括也有独到之处。在他看来，直面纷繁的世界，表现纠结的心理、处理棘手的矛盾，乃是自乔叟、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文学的现代性所在。

总的来看，麦克法兰的这部著作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形象，几乎处处都可以用来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现代世界的诞生》
(英) 麦克法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书推荐



《父母需要长大》
孙铨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和孩子一起成长是个快乐的过程，但是当我们缺乏理念和技巧的时候，这个过程会有痛苦。和孩子一起培养孩子读书习惯、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作者观点立体而独特。



《恶童日记》(纪念版)
(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用冰冷不带感情的独特手法呈现出一对8岁的双胞胎兄弟在战争背景下，面临残酷环境时的生存法则，锋利地表现了战争中的人性主题。



《神经漫游者》
(美) 威廉·吉布森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该书讲述了一个天才黑客，一个女杀手，一个特种部队军官，一个意识操控专家受雇去做两件事：偷一把钥匙，获得一个密码。他们是职业罪犯，同时也是无可救药的厌世者；他们自我放逐，同时也在下意识寻找一条回家的路……



沙山下的月牙泉边散步，他救起了一只受伤的大雁。以后每天，他都要带上当时极为匮乏的食品，到泉边喂养这只大雁。大雁渐渐复原，和张大千成为好朋友，每天一落晚，无论风雨阴晴，都要守在湖畔，等候他的到来，陪着他散步。这幅喂食照片，就是当时相随的中央社记者罗奇梅现场拍下来的。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大千离开敦煌的日子临近了。离情依依，张大千生怕令他的大雁朋友伤心，便不等天晚，早早率领众人登车离去。没想到，车子刚刚驶过月牙湖，天上便传来一阵大雁的哀鸣。众人抬头看去，一只大雁就在头顶上一圈圈地盘旋，追着车子，发出尖厉的响声。张大千赶紧让车子停下，他刚刚跳下车，那只大雁便嘶鸣着从高空俯冲下来，直直扑向他的怀里。张大千搂住大雁，泪水悄然而下。他抚摸着大雁，大雁也久久依偎着他。众人都被这一幕人雁相依的情景愣住了。良久，张大千拍拍大雁，把她放飞到空中，大雁一声尖啸，打了一个旋，终于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张大千挥挥手，登车离去……

每次说到这里，张先生眼里都噙着泪光。“动物的情感，其实与人世的冷暖冰凉，是完全相通的。”张先生喃喃道。

我久久凝望着那张照片。相框边上倚靠着一小块灰色的人形石头。“这是我日后在敦煌月牙泉边捡拾的，你看看，像不像一个小小的站立的观音？”张先生轻轻说。

《天涯晚笛》
苏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 几又

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骨节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本书主要焦点当然是陈寅恪，但作为历史的一些旁证，作者大量描绘了当年的诸多学者，其中就包括胡适等人。在陈寅恪生命的最后20年，胡适实际已远在异国他乡。当时，国内批判胡适气氛甚浓，有赴海外的国内人士曾对胡适解释，称这些批判只是针对他的思想，而非他本人。就此，胡适铿锵地回答：“没有胡适思想，便没有胡适本人。”胡适尚可义正辞严，毕竟身居海外，相较而言，身处南国中山大学校园的陈寅恪是公认的史学大师，学术权威有目共睹，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虽然他也一直努力挺直腰杆，但遭遇显然比胡适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

一方面，包括陈毅、陶铸、郭沫若、周扬等人在内争相登门拜访陈寅恪，并以能同陈寅恪有过一席畅谈而倍感开心。像郭沫若见过陈寅恪后，“向留在北京的秘书兴奋地谈到了与陈寅恪的这次见面”。周扬在与陈寅恪会谈后，“掩饰不住兴奋”；另一方面，对陈寅恪的所谓批判一直如影随形。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一生傲骨铮铮的陈寅恪最终被迫做了“检讨”，虽多数为大话套话，但真实地折射出大师处境的艰难。与胡适、郭沫若、顾颉刚等人六十岁后便步入学术成就低

祖籍我国台湾的日本作家陈舜臣，创作过数量惊人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包括《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成吉思汗一族》、《中国历史风云录》，等等。他的作品简单通俗，场景描述和人物刻画均显功底。对涉及到的历史细节也作了大量的考证探讨。作品虽然名为小说，纯粹虚构的地方却不太多，而且一些虚构也能融入历史，本身是历史上可能发生、可能出现但最终没有发生或出现的选择，因而反倒不显得多么牵强。

陈舜臣之所以会创作那么多的中国史小说，固然与其华裔身份相关，但也出于日本民众对中国史持续的兴趣。

陈舜臣根据宋末元初《十八史略》而改作的《小说十八史略》，在周刊连载后就受到日本读者的热烈追捧，1977年集结出版后也一直高居日本畅销书榜前列。畅销书不等于

很日本的中国史小说

□ 郑渝川

好书。但陈舜臣的作品除了长期畅销之外，还获得了日本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较高评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的《陈舜臣十八史略：易水悲歌》，是这套书的第一册。阅读该书不仅可以让我们这些中国读者了解本国历史通俗作品的另一种写作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日本精英乃至平民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点，找出我们所能忽略的着眼点。

《陈舜臣十八史略：易水悲歌》用小说体重写了神话时代至秦朝的中国史。这本书，或者说陈舜臣历史小说的吸引力，显然首先来源于而今已被许多更为年轻的中国历史小说家演绎得更为纯熟的一个手法，即对完整和严谨的对待历史(或神话传说)，以口语化的叙述口气，再穿插社会性视角的点评；而在介绍涉及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人物)

从卑微走向澄明的阶梯

□ 刘 晗

地而永远不被重视。

被众人投来关注的目光有时不在于激进的争论之中，有的人滔滔不绝，但是他好像什么也没说；有的人很沉默，但他却说了很多。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思维模式——“米尔顿”会更有说服力，使用提问代替命令，通过发问不断形成观点，并利用“催眠”的语调和“前提”协议使其他人更难驳斥和反对你。切莫急于让他人与你进入一个方阵而缴械投降，刻板印象不是一天形成的，在其他人的思想里种下一颗观点的种子要比命令更加有效。当你被攻击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除批评者的武装，而不是逃跑或者反击。

自信是领导他人的前提，社会毕竟不是一个实验的“理想模型”，不同性格、观点、需求产生差异和碰撞，锤炼出标准化人群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因此，尝试和多种类型的

《做更自信的自己》的作者保罗·詹那曾采访过一名新晋百万富翁，他买来一艘小游艇，因其他的游艇都远远比他的豪华就变得失落万分，很显然，他的自我价值被物质完全剥夺了。

古老的冥想技巧辅之以现代心理学中冷静的发问，针对自信缺乏症粉碎消极思想的实践训练，由此建构自信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践与理论整合后走向个性化定制的诊疗。发现真实的自我，让不同的机会进入生活，经历以前闻所未闻的感受与事情，卑微的克星在于打破平庸，不要浪费时间在“应该”做的事情上，而是花时间在觉得“值得”做的事情上，在异于寻常的体验中独处，形成独特的个人体验，这是与众不同的来源。不必担心这些另类会与他人产生隔阂，那块没有差异的世界将会是一块贫瘠的土

□ 晶晶 整理

到第一份正式的教中国文学的教职，我们便在斯坦福待了两年。那两年我就不再做事了，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你的两个孩子……”我正要开口询问，老人接过了话头，“我们两个孩子都是抱养的，男孩子在伯克莱的时候抱过来，那时才刚出生，今年整整五十了。到了斯坦福再抱养了一个，是女孩……”

老人忽然沉默了下来。我知道，在美国，照料孩子，一般是请不起保姆阿姨的。这位从小就在“干干”(妈妈)和保姆怀里长大的“张家四小姐”，在异国异域与夫婿一起白手起家，抚育教养一对儿女，其间经历了何等的艰辛，老人却没有多言。

“汉思是一九六一年到的耶鲁。耶鲁一开始给他的就是副教授的职位，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安定下来了。我在耶鲁又恢复了做事，一直在他们的美术系part-time(兼职)教书，主要教中国书法，一直做到七十岁退休。”

“在耶鲁这些年，我有两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是安娜，她是早年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学中文的，会昆曲，她的老师就是我从前老师的学生。她的笛子吹得很好。这些年我唱昆曲，都是她给我吹笛子伴奏。她一直在联合国中文部做事，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退休好几年了。另一位是咪咪(Mimi)，她是美国人，原来在耶鲁博物馆做事，后来去了西雅图，做了比尔·盖茨的继母。”我大吃一惊：“你说的比尔·盖茨，就是那位建立计算机微软王国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么？”对的，“老人笑着点头，“我认识咪咪的时候她还是汉思的学生，跟我学书法，学草书，她后来留在耶鲁做事，做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她人非常好，在这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我

一直给她帮忙。后来她到西雅图博物馆去了，在那边认识的比尔·盖茨的父亲。去年，我在西雅图办的那个‘古色今香’的展览，就是咪咪请我去，并亲自操办张罗的。我在那里，也见到了比尔·盖茨。”

没想到，一生与中国现代史中各种精彩人物有着广泛联系的张充和老人，在她的耶鲁岁月里，也与比尔·盖茨这样一位改变了当代世界历史的精彩人物，发生着如此间接却紧密的联系。

古琴与古琴：京昆之别？

那天，和充和老人随意聊起这样一个话题——

我说，我注意到，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古琴与昆曲，是两个特别的门类。他们自成一个圈子，自称“琴人”、“曲人”；聚会叫“琴会”、“曲会”；喜欢小范围的自娱自乐，叫“拍曲”、“抚琴”……我还提到，古琴和古筝这两样乐器的区别，很像是昆曲和京剧的区别。

老人颌首赞同，笑吟吟说道：“习惯了唱昆曲，会觉得京剧太闹人。”老人呵呵笑道：“其实，我也学过京剧戏，还找过程砚秋当老师呢。”

老人笑应：“我不能算程门入室弟子，我不是个好学生，我学了几天就学不下去了，还是不习惯京戏，觉得闹，喜欢昆曲的安静。所以，程砚秋不会让我这个学生的，虽然我喜欢听程派的戏。”

于是我们聊起了京剧。老人的许多见解也让我暗暗吃惊，“我不喜欢马连良的戏，他唱得太漂

亮，太甜，好是好，我嫌他油，老生不能那么唱的。”

“大家都喜欢的，我未必喜欢呀，”老人突然冒出一个新话题，“就像林徽因，大家都喜欢她。在昆明的时，她爱说话，永远是众人的中心，只要有她在，大家就都得听她的，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老人突然停住了。

张充和平日很少在她的言谈中臧否人物。可过了一会，她又想起了什么，笑吟吟说道：“不过我对陆小曼，却有不错的印象。她人很温雅，话不多，也会唱曲，一笔山水花鸟画，画得像样子……”

林徽因、陆小曼，两人都因与徐志摩的罗曼史(还可以加进梁思成、金岳霖)而声名显赫于民国时代。其实，她们两位，和张充和一样，都是民国时代的才女——一代新女性的不同代表。看着眼前的充和老人，我心里在默默地比较着(当然，不敢言声)。

我笑着：“张先生，看来民国时代这些文化名人，没有几个是你不认识的。”

张大千的大雁朋友

每次拜访张先生，总爱听他讲点民国时代的人物故事。在她习字的案桌边上，摆着一幅美须飘逸的张大千俯身在水边给一只大雁喂食的照片。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老人家又给我讲起了张大千和这只大雁的故事——

抗战年间，张大千曾经“面壁”敦煌数年，在敦煌石窟的洞穴里临摹、习画。有一天傍晚在鸣

速读

她虽远在美国，却穷尽一生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字、画、诗还是昆曲，她在当代都属上乘，她被称为“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生于1913年的她已度过了百岁生日，她是张充和，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中最小的妹妹，也是公认的最具才学的一位。

最近，张充和的口述实录《天涯晚笛》出版，这是张充和向学生苏炜断断续续口述的人生故事。

张充和谈美国岁月

□ 晶晶 整理

我做事吧， 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

一九四九年一月，张充和与她的美国夫婿傅汉思，在上海港上上了“戈顿将军号”海轮，前往美国，开始翻开她多彩人生的新的一项。“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汉思父母家在斯坦福，我们在他家住了一阵子，后来汉思在伯克莱大学找到事情做，我们就在附近的伯克莱安居。”

张先生在沙发上换了一个坐姿——老人从来都是坐姿端庄，仪容端正的，向我娓娓道来——“汉思的博士念的是诺曼斯语研究，可是回到美国他就不想再做诺曼斯语了，他想转向中文。赵元任他们那时候正在伯克莱，也很鼓励他。可是你知道，他已經有一个Ph.D了，要转一个专业方向，没那么容易啊。”老人眯缝着眼睛，好似回到了那一段辘辘的岁月，“那时候我们生活很穷，没什么钱。汉思在伯克莱一直是做part-time(兼职)，他的工作也不属于中文系，有时教中国历史，有时编辑刊物——编一本叫《中国史译丛》的刊物，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九，整整十年，汉思都没有一份full-time(全职)的工作。”我那时是在伯克莱的图书馆做事，倒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我知道他就卡在一个与中文有关的位子上，就说：‘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老人的语气变得短促、坚定，让人想起这位“张家四小姐”因为自小离家而养成的那种独立、执著、自助自强的个性。“我在伯克莱图书馆，做了八年全职的图书馆员。汉思后来申请了哈佛的中文博士课程。一九五九年，汉思在斯坦福拿